四平路的人文之光

张国伟

有读者问，你在《为啥叫“邯郸路”？》一文（刊于新民晚报2019年6月15日夜光杯）中，提到五角场“因地处市区东北角，多以东北地名命名马路，如营口路、嫩江路、白城路、佳木斯路、松花江路等”，为什么不提“四平路”呢？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四平位于吉林省，确实是东北地名；但四平路却与五角场其他以东北地名命名的马路不同。四平路筑于1930年，原名“其美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同盟会元老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1913年，他曾多次协助孙中山武力讨伐袁世凯。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遇刺身亡。“其美路”，就是为纪念这位辛亥革命功臣而命名的。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陈其美是一位争议人物，因为他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叔父，还与蒋介石订过金兰之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关部门将其美路列为“重新订定”的路名之一。1950年5月27日，在部分道路“改用革命策源地及重要战役地址等名称”的公告中，其美路被改名为“四平路”，以纪念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四平战役”。可见，四平路与邯郸路一样，也不单是以地理概念命名的马路。

其美路筑成后，就是一条学人荟萃的马路。原来的其美路起点在天水路，西南端的新陆村（后改名新绿村，原址在今四平路、欧阳路）曾是新陆师范专科学校教师宿舍，新陆师专后来易名“市立师专”，诗人戴望舒、作家施蛰存、翻译家孙大雨和历史学家陈仁炳等先后在该校任教或兼课，住在新陆村。陈仁炳先生后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改革开放后复出，教我们《世界史英文名著选读》。前些日子查阅史料，我惊讶地发现，《上海市立师专校歌》竟是陈先生创作的。

抗战胜利后，同济大学由四川李庄复员返沪，因吴淞、江湾校舍在战时被毁，便以其美路上的原“日本中学校”为主要校舍。1946年复校时，同济除了有以土木系主任李国豪为代表的理工医科名教授外，还延聘古典文学家郭绍虞、剧作家陈铨等教授任教，茅盾、施复亮、马叙伦、田汉、洪深、臧克家和马寅初等先生都曾应邀到同济礼堂演讲。1947年起，国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高涨，同济师生积极响应。1948年1月29日，国民党军警包围其美路，镇压同济师生，酿成严重的流血事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这场斗争，同济礼堂被命名为“一·二九礼堂”，同济文工团创作了话剧《同济风暴》。听说，后来《同济风暴》的部分片段，被著名电影《大浪淘沙》采用。

1948年8月，准备绕道香港去解放区的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抵沪，住在他弟弟春曦家里。一天晚上，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邀请吴晗谈谈北平情况。当时，住在新绿村（即新陆村）的历史学家程应镠先生接到通知，就与孙大雨先生一起在其美路上雇了一辆三轮车去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开会。据他回忆，“这次集会，很晚才结束，大雨先生和我就从麦伦中学散步似的回到新绿村，走进家门已经过十一点了。吴晗来上海之后就去了解放区，我在来喜饭店请他吃饭。这一年，他正四十岁，我说：‘就算是为你祝寿吧。’席上有春曦，好像还请了陈仁炳作陪，他们两人同年，因此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程应镠《回忆大教联片段》）当年，来喜饭店是复旦师生公认的“校外食堂”之一，位于复旦老校门对面的国权路上，离其美路不远。从上述回忆分析，吴晗先生不仅在国权路留下过足迹，也很可能踏足过其美路。

改革开放前后，四平路一度与邯郸路十分雷同：在五角场环岛五条主干道中，两条路都通往市中心；靠近环岛处，都有往返五角场的公交起讫站和千篇一律的住宅；在两条路的中段，各坐落着一所著名大学校园（同济与复旦）；两所大学校门对面，都有一条貌不惊人的商铺街（彰武路与国权路）……外地人初来乍到，很难辨识。网上曾流传过一个笑话，说是一位刚入学报到后的复旦新生，走出校门沿着邯郸路到五角场闲逛，晚上归来却沿着四平路走进了同济——这并非完全杜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复旦读书时就听过这个逸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除了周边环境，四平路上的人文色彩，也与邯郸路极为相似——深邃而有底蕴。

蒂勒曼的瓦格纳情缘

刘 蔚

蒂勒曼是当今德国最负盛名的指挥家，现任德累斯顿国立管弦乐团与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音乐总监、拜罗伊特瓦格纳歌剧节音乐总监。最近，在《我的瓦格纳人生》一书中，蒂勒曼首次以文字的方式，生动翔实地呈现了他与瓦格纳歌剧的不解之缘。

蒂勒曼的父母都是古典音乐和瓦格纳迷，家里收藏有不少瓦格纳歌剧的唱片。1966年6岁的时候，他就去听了“指挥皇帝”卡拉扬指挥的瓦格纳歌剧《女武神》，瓦格纳作品的气氛、色彩和配器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他因此萌发了要当一名指挥的念头。他曾经在家里把总谱放在膝盖上，对照着一遍又一遍地聆听他喜爱的瓦格纳四联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唱片——卡拉扬1960年代录制的版本。1980年，20岁的蒂勒曼在奥地利萨尔斯堡复活节音乐节为卡拉扬指挥的《帕西法尔》担任助理，他终于有机会向自己心中的偶像请教如何发展自己的指挥技巧、积累经验，卡拉扬告诉他：通过毕业考试，然后就去实践吧。于是，通过担任歌剧院的歌剧陪练积累曲目，不放过任何一次观摩和实践的机会而不断提高，蒂勒曼的艺术之路，基本上就是按照卡拉扬指出的方向走的。1999年，已经担任柏林德意志歌剧院音乐总监、指挥过不少德奥歌剧的蒂勒曼正在美国与芝加哥歌剧院排练新版的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一天，外面下着大雪，蒂勒曼拿着一瓶可乐和烤玉米片或炸玉米饼之类的食品刚走进住所，就接到了拜罗伊特管弦乐团的负责人打来的电话，他代表拜罗伊特瓦格纳歌剧节的主持者、瓦格纳之孙沃尔夫冈·瓦格纳，邀请蒂勒曼去拜罗伊特指挥《纽伦堡的名歌手》，蒂勒曼又惊又喜，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他与拜罗伊特的情缘，由此展开。

拜罗伊特小镇位于德国的上弗兰肯地区，一年一度在这里举行的瓦格纳歌剧节是全世界瓦格纳迷的朝圣中心。19世纪70年代，在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资助下，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绿山上建起了节日剧院，专门用来上演他自己创作的歌剧。在节日剧院上演的瓦格纳歌剧作品，可以充分展示他的乐剧理念和整体艺术的风采。拜罗伊特由此成为古典音乐爱好者和瓦格纳迷们的麦加圣地。自2000年在拜罗伊特首次指挥《纽伦堡的名歌手》，第二年指挥《帕西法尔》，2006年指挥全套“指环”，蒂勒曼在德奥音乐界和世界乐坛声誉日隆。2005年，蒂勒曼众望所归，出任拜罗伊特瓦格纳歌剧节的音乐总监。

蒂勒曼熟悉拜罗伊特的一草一木，迷恋节日剧院中散发出的浓郁的瓦格纳气息，时时追寻着前辈音乐家在这座瓦格纳圣殿留下的足迹。1930年，托斯卡尼尼成为第一个在拜罗伊特登台的“外国人”，指挥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唐豪塞》。托斯卡尼尼以脾气火暴严厉著称，排练时折断了好几根指挥棒，然而演出成功后，音乐家们高高兴兴把他举过头顶，抬出了节日剧院。1951年，63岁的克纳佩茨布施第一次登上拜罗伊特的指挥台，但一年里就指挥了《帕西法尔》、《纽伦堡的名歌手》和“指环”，直到1965年去世，他几乎每年都来拜罗伊特指挥。据说克纳佩茨布施不喜欢排练，有一次，他对乐队说：“先生们，这个戏诸位都会，我也都会，咱们今天晚上见吧。”

蒂勒曼将拜罗伊特视为自己上过的唯一的指挥学校。在瓦格纳歌剧艺术里经年累月的浸淫，在拜罗伊特的大量艺术实践中，他对指挥艺术的要义有了新的认识。他认识到指挥就像一个极限运动中不断攀登更高山峰的登山者，他需要让自己适应环境，熟悉工作范围，否则就会失败。他必须相信他能够征服山峰，一步一步地行走，一拍一拍地指挥。蒂勒曼感到自己就像《帕西法尔》中的一个角色，“年复一年地我们揭开圣杯的面纱，但是从来不知道那是不是真正的圣杯，我们是不是真的找到了它，或者是否有一天能找到它”。也许，正是这种对瓦格纳歌剧、对古典音乐无限的探索和好奇之心，将支撑蒂勒曼在艺术道路上行稳致远。

夏风（水彩画） 史 涛

学习『放下』

汤啸天

我有一位老年丧偶的好友对我说，老伴临终之前留过一句话：“我走了以后，你好好过日子，让我也安心！”我问：“老伴的叮嘱，你听懂了吗？”好友回答听懂了，但就是放不下。由于是好友，故我直言，是没有真正听懂老伴的心愿。好友解释说，他心里知道该放下，但却做不到，每天凌晨两点会醒来，满脑子都是老伴的身影。

一般而言，老年人“放不下”的一是感情，二是事业，三是兴趣爱好。越是重情感、甘奉献、责任心强的人，学会“放下”的难度就越大。感情中最怕的就是“放不下”，一旦你因为“放不下”而无法自拔，受伤的一定是你自己。现实是无情的，无论是你爱的人不爱你，还是爱你的人突然离去，你千万不要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梦境里。特别是单身老人，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故去以后，一定要直面现实，承认已经发生、不可改变的客观现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把对故去老伴的思念称之为“刻骨相思”是符合情理的，同时，学会“放下”更显重要。勇敢接受现实，让过去的事情随着时间慢慢忘淡才是理智的。人生有许多东西需要放下，接受夫妻之间相伴几十年感情的突然中断需要自我修炼。这种修炼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必须自己约束自己。

“放下”是需要学习的。首先，是要真正“舍得了”。当然，难点在于舍不得。老伴已经离去，要接受这种终了状态。“送君千里，总有一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相伴几十年之后的分手令人依依不舍，但是，现实必须接受，再不舍也要舍。“放得下”是人生面对现实的理智选择，“舍得了”是必须主动而为的生活安排。每一次早醒思念都在起到记忆重复、情感强化的作用。久而久之，不断强化的记忆像漩涡一样产生下坠的力量，也就怎么也“放不下”了。要想放下，应该主动改变生活环境，比如清理可能触景生情的物品，避免睹物思人，勾起对往昔的回忆。此外，改变作息时间，按照医嘱适当服用一些有助于睡眠的药物也未尝不可。

对老年人而言，不要沉浸于昔日的“拿得起”，导致今天的“放不下”。“拿得起”已经是“过去时”，年龄越大就越应该“放得下”。“拿不起”难免碌碌无为，“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过去的“拿得起”是能力，今天的“放得下”是智慧。如果是事业上的“放不下”，必须要告诫自己：一是“年龄不饶人”，不能用过去体能和精力要求自己；二是“钞票赚不完”，应当自觉地放弃一些收入；三是“相信年轻人”，把有些事让出来给年轻人施展才华。在感情生活中，当事过境迁，就不能沉醉回忆中，否则无异于自虐。这也提醒着我们，珍惜身边人，在“拿得起”的时候好好善待。

定胜糕

肖弘哲

杭城六月，蝉鸣树间，火轮高吐，烁金流石。余乃北人，素来耐不得酷暑炎炎，故每逢烈日中天，常须觅一阴凉处，轻摇折扇，乘风纳凉。若囊有余钱，择家茶楼酒肆，叫上半壶龙井，一份定胜糕，大可消磨一个下午。

定胜糕，江南名吃，苏浙沪闽皆所常见。糕身色泽淡雅，松软清香，制作时又有商家将模子做成各式花样，将制成的糕点摆在一处，造型各异，分外别致。

城内依旧法做定胜糕的已是不多，杭州人口中老底子的味道怕也不大容易找寻。余在杭工作时曾与住处守门的老两口闲聊，正巧遇见其自制此点心，只见老阿姨将早已加过砂糖，由粗糯、粳粉制成的糕粉中放入糖桂花和红曲粉，调好后取出模子，先垫一层糕粉，逐个铺上豆沙，再用糕粉盖住，用竹片刮平，最后细细地撒上松子仁放进蒸笼。

老阿姨满头白发，安安静静地，动作不疾不徐，沉缓安详中，可见年轻时的风韵。点心模子是硬木的，已有些年头，许是用得多了，被磨得锃亮。梅花形的凹槽里刻着麒麟送子的图案，说到是当年出嫁时从娘家带过来的，老阿姨眉目间又多了几分笑意。桂花是南高峰捡的丹桂，洗净了和糖腌在一起，尤其香甜。

兴之所至，亦跟着做了几个，口感颇佳。聊天中得知，定胜糕相传是南宋韩世忠大战金兀术时，临安百姓为鼓舞士气所制，后来取其“定胜”彩头，有迎亲乔迁，也特制此食。南宋当年究竟如何光景已不得而知，但记得小时读《水浒传》，宋江等受招安时就提过此糕，回家翻书确实是了。

杭州清河坊御乐堂的定胜糕也做得不错，除独自清饮外，余每次请客，亦必点此糕，不惟味道可口，亦图个吉祥。

暑期参加崇明围垦

李思源

五十年前在上海呆过的几十万大学生、机关干部，甚至部分工厂工人都参加过声势浩大的崇明围垦活动。

从大学二年级起我们每个学期都要去，每次一般半个月。说实在的，那时与其说是劳动锻炼还不如说是体验生活。绚丽的晚霞、艰苦的条件、粗犷的吆喝、成片的芦丛、往往使我激动不已。后来结识了一位当地的老农，他的上门女婿要回老家照顾生病的老母，队里缺人，问我是否愿意在暑假里顶替他女婿，包吃包住一天还有六角“津贴”，那时一般人一个月的伙食费是18元，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当时去崇明唯一的途径就是从吴淞码头坐小渡轮，晚班船好像票价便宜些。渡轮不停地颠晃，不少人呕吐得很厉害。

上岸再乘一个小时左右的汽车到“工地”。工地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滩，海滩的高处密密地排着许多“宿舍”：人字形的芦苇棚和帐篷，前者被戏称为“列宁式的小茅屋”，因为其外形像油画中列宁流亡在芬兰的小茅屋一样。

所有的“宿舍”都是统一的“装修”：用黄土垒的约20厘米高的大“床”上铺着一层芦苇“蓆子”，大家先把塑料布摊在下面，垫上毛巾毯后就可以睡觉了。绝大多数人都是一床毯子半垫半盖，累了也就酣然入梦乡了。半夜里床上爬上来几个小虫或“乌小蟹”是司空见惯的事。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运泥筑大堤，那时的劳动方法和工具还是很原始的。健壮的男工不停地用崇明长锹铲出一块块长的土块，每块约10斤；一般人用扁担挑，每一头二到三块；个别身体差的每俩人用二根粗竹竿穿在草绳编的网篮里用“担架”的形式运土。到目的地一般有三、四百米，每天六、七个小时走下来也是够呛的。

就是在这种“人海”战术下一条条长数百米，顶宽10来米的梯形大坝就这样一段又一段地竖起在崇明岛的海边。

天热的时候室外温度经常超过40摄氏度，下午即使改成三点开始劳动，脚底下还是滚烫滚烫的，身上的皮脱一层又一层，结束后个个都泡在小河里，连饭都不想吃。

好几次潮汛之际彻夜巡逻，有一次海堤被冲垮时，在暴风雨中连续战斗了36个小时，比冬天作为学生时的劳动艰苦多了。

不过也有非常多的乐趣，除了友谊和天象知识外，我学会了识别各种野生蘑菇，懂得怎样挖芦根和抓蟹，学着做“老白酒”，实践了土方的体积估算和工程测量，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第二年暑假和第三年毕业后上班前的一段时间我仍然乐此不疲，在崇明的几个“沙”里战斗。

如今从静安寺上车，经“上海隧桥”到陈家镇只消一个小时，不仅南门港、竖河、堡镇等小镇的现代化已经认不得了，东平森林公园、东滩、西沙湿地等都让芦苇滩涂变成了高端的花园和研究保护区，还有新兴的高科技园和极漂亮的学校……我心里充满了骄傲，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围垦大堤庇护下的精品。

十日谈

老底子格暑假

责编：殷健灵

那年暑假，在弄堂小伙伴的帮助下，我们自己动手做了围棋，过程虽辛苦，大家却都很高兴。